

常民自我敘事做為一種媒介言說：
閱讀《聯合報》「家庭與婦女」版上的女性話語與聲音^{*}

王右君^{**}

投稿日期：100 年 2 月 21 日；通過日期：101 年 3 月 6 日。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報紙個人敘事中的性／別主體建構：以聯合報「家庭副刊」、蘋果日報「人間事」和「人間異語」為分析對象】第一年期計劃（NSC 98-2410-H-006-063）的部份成果。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使本文有今日的呈現。

^{**} 作者王右君為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e-mail: yowjiun@mail.ncku.edu.tw。

《摘要》

本文探討兼具參與轉向和自我揭露特質的《聯合報》「家庭與婦女」版，如何形成媒介上的常民女性敘事社群，提供女性大眾經由自我敘事參與建構性別論述的機會。藉由版面觀察、訪談和言說分析，研究者指出該敘事社群在經驗分享和平等互助的基礎上相互啟發、彼此對話，並傾向透過敘事中的自我評價直接或間接提出女性角色論述。

關鍵詞：女性版面、自我敘事、家庭版、媒介言說、親身故事

壹、前言

一九八八年台灣報業隨政治改革運動解除張數和新報設立限制，掀起媒體解禁第一波浪潮。在報紙篇幅驟增、人人有話要說的新時代，各報紛紛開設民意論壇版面，成為全民參與公領域的新戰場。當公共事務論述權力在解禁風潮中開始下放，常民百姓也在這塊新樂園上找到舞文弄墨的空間。傳統幾家大報紛紛開發所謂的「第二副刊」，以日常生活、尋常人間紀事為書寫對象，廣徵讀者投稿，以別於菁英作家寡占的傳統文學副刊（第一副刊）。在強調通俗品味和大眾參與下，這些第二副刊多少間接提供了大眾讀者參與並實踐公共文化的路徑（向陽，2001，頁 48-49）。

值得關注的是，這波媒介近用權下放的運動，也悄悄在傳統女性版面上展開。讀者投書在家庭版或類似版面上歷史悠久，但晚近幾年更為蓬勃（劉佩詩，2006），包括《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的相關版面，乃至《蘋果日報》的彩色副刊「人間事」（以情欲經驗為旨），都有顯著的讀者參與內容生產空間。其中，中國時報的家庭版在 2008 年 8 月、中時集團易主前夕的大改版中走入歷史；而《聯合報》家庭副刊的「家庭與婦女」卻在報社強調「與讀者互動」、「在『高格調』與『大眾化』間取得平衡」，以及「全民寫作」的政策下（楊選堂，2001，頁 185），逐漸轉型為以讀者生活故事為全版內容，並發展成該報閱讀率最高的版面之一。¹

相較於傳統家庭版多半為記者、編輯撰寫的報導文字或名人、專家執筆的意見諮商，目前的聯副「家庭與婦女」版（以下以「家婦版」簡稱現階段的「家庭與婦女」版）以家庭生活為題旨，限定一般讀者投

稿，不作名人邀稿或訪談；內容訴求讀者自發寫作和親身故事，不著重文章的書寫技巧或文學性。² 或因讀者對於家庭版的刻板印象，也或如該版主編所臆測，男性較不喜揭露個人私事，投稿者除少數退休男性外，大抵為女性。就內容生產者和閱聽人關係而言，「家婦版」的投稿者往往來自該版讀者，這種生產者和閱聽眾界限的模糊化，或多或少趨向跨世紀以來，傳播媒介以網路公共論壇和草根新聞媒體（例如公視的公民新聞平台網站）為極致表現的「參與轉向」（the participatory turn; Wang, 2005, p. 8）。另一方面，「家婦版」的內容訴諸揭露個人私領域生活、真實感受，甚至創傷經驗等，在若干程度上貼近 1990 年代以降在歐美媒體上，尤以脫口秀和真人實境節目（reality TV）為最的告白文化（confessional culture; McNair, 2002）。這種強調常人自我揭露的媒介風潮自 2000 年以來隨此類外國節目的輸入進入台灣，也促使本土真人實境節目的紛紛製播（簡妙如，2008）。所及之處不僅為商業電視台，亦包括公共電視，例如近年來播出的「爸媽囧很大」和「誰來晚餐」等節目，都可以視為這種自我揭露風潮的產物。儘管揉合了參與傳播和自我揭露的特質，「家婦版」上由非文化／媒介菁英女性所生產的素人文本，卻非上述媒介形式可資概括。雖然訴求大眾參與，但「家婦版」畢竟不比網路空間，受限於傳統平面媒體的操作機制；在參與媒介內容生產之際，其特有的私人敘事性質，與公共論壇式的意見討論大異其趣；同是自我揭露，「家婦版」的敘事以自發性書寫為體，與前述經過設計、藉由攝影鏡頭捕捉和口語傳達的真人實境節目或脫口秀亦有顯著不同。

從台灣家庭版或女性版面的歷史來看，「家婦版」亦因其參與轉向產生別於現行相關研究所述及的意義生產空間。儘管「讀者投書／來稿」早已存在，似非前述媒介風潮的追隨者；然而，該版長期以全版刊

登常人親身故事，在量變帶來質變所造就的言說空間，並非過往個別、零散的讀者投書模式可比擬。本地平面媒體除了「家婦版」外，尚有若干大篇幅常態性刊登讀者故事的版面；書寫之外，參與式的常民（ordinary people）自我敘事尚可能以其它媒介形式呈現，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始於 1990 年代中期的 Video Nation 計劃，由閱聽人持家用錄影機拍攝個人日常生活和描繪自我，以呈現英國多元文化社會風貌，即可視為一例。這些說明了自我敘事／親身故事在當前媒介言說佔有的位置，以及有賴我們進一步分析了解之處。

綜觀以上，「家婦版」以女性私領域生活、自我揭露的親身敘事、讀者自發性參與以及親民的寫作門檻等特質，提供女性大眾近用媒介、揭露日常生命經驗和生活處境的言說空間。如傳播學者所論，所有生產於媒介文本上的文字、聲音和影像訊息均可視為媒介言說（media discourse），建構特定思考框架並引導人們思維與論述事物的路徑（Macdonald, 2003, pp. 1-4; Bell & Garrett, 1998, p. 3），做為大眾媒介言說的一環，「家婦版」的常民女性自我敘事是否也參與了女性議題的論述建構，而這種論述建構經由何種方式進行；同時，當這類敘事成為單一常態性版面的唯一內容，對於敘事者之間的關係以及版面內容的持續性生產又可能產生何種影響。透過分析聯副「家婦版」，本文試圖探討大眾媒介上女性敘事社群形成的可能及作用，以及常民女性如何藉由自我敘事參與性別論述的生產，據此，我們亦得以檢視常民自我敘事做為媒介言說的意義。

以下篇幅首先從文獻回顧，說明家庭版或女性版面在論述女性角色上的意義，接續探討參與傳播、自我揭露和敘事社群三者之間的關係，並且闡述女性自我敘事做為大眾媒介言說在性別論述建構上的可能意義。文獻回顧之後，續以「家婦版」的個案研究，藉由版面觀察和言說

分析，指出該版如何在常民參與和敘事導向的編輯策略下，形成以分享和共濟為互動基礎的女性敘事社群；隨後以女性家庭角色做為樣本編碼依據，指出版上敘事傾向反思女性角色的特質，並以個別文本做為言說分析的對象，說明敘事者如何經由自我評價參與建構女性角色的論述。必須一提的是，本文雖以女性自我敘事為名，但在論及女性角色時不免受限於異性戀家庭框架。一方面，就有限樣本，未見有關同志家庭的敘事，另一方面，同志家庭與異性戀家庭的經驗殊異，也很難在一個框架下討論。或許，同志經驗在傳統家庭版中的能見度，是另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議題，有待未來研究補足。

貳、文獻回顧

一、家庭版與女性角色論述

有關家庭版和女性版面的本地學術研究，經常追隨媒介反映論的觀點，視此類版面為反射社會真實的鏡子，藉由分析版面內容觀察諸如台灣社會在家庭價值或家庭概念的轉變（湯克遠，1979；蘇芳瑩，2000），當前女性意識的發展（田裕敏，1998），以及職業婦女在職場和家庭生活中的處境（賴信真，1996）等問題。晚近研究則採取建構論的觀點，探討家庭版在女性角色建構上的意義；在回顧「備受爭議卻不受重視的女性版面」之產製時，學者蕭蘋（2002）綜合文獻指出，報紙家庭生活版面在報業經營傳統中被設定於私領域的範疇，實質內容經常將女性約限在家庭與消費者的角色上。近三十年來（1970 至 1990 年）主流報紙（《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的女性版面，雖逐漸肯定女性在職場和個人發展上的重要性，但內容上仍以家庭關係和家務勞動為主

要主題，而維繫美滿家庭則被視為女性存在的要務（蕭蘋，2003）。

除了探討家庭版內容與女性生活的再現關係，文獻亦指出家庭版的公共討論功能。就本地報業而言，以讀者故事或意見為徵稿對象的「讀者投書」，可溯及 1950 年代；1963 年 11 月到 1964 年 1 月間，中國時報家庭版因為一篇自述徘徊於母職與婚外情之間的女性讀者來文，引發了上百篇（刊出十六篇）表達責難或支持該文的讀者回應文（劉佩詩，2006，頁 96-99），說明家庭版在若干時刻扮演著以家庭制度為議題核心的常民公領域，也指出家庭副刊讀者潛在的積極釋義行動與情感上交流的可能。此外，家庭版在過往歷史中亦扮演了推動婦女權益的中介者角色，例如，《中國時報》的家庭版即在報禁解除之後，以新聞報導和漫畫等積極鼓吹女性解放的議題，也因此招致報社高層的關注和壓抑（江靜芳，1995）。

這些研究顯示了家庭版做為一種媒介言說空間與女性角色論述之間的緊密關係。傳統上家庭版或女性版面上的文字多以軟性新聞報導、專業諮商、意見評論等類型出現，其撰寫者多為記者、編輯、專家和名人等。西方研究指出，媒體內容生產的管控往往掌握於男性手中，並經由刻板化的性別形象再現鞏固現有性別秩序中的不平等關係和意識型態（King, 1992）；國內經驗亦顯示，男性媒體主管可能扮演壓抑進步女性言論的角色（江靜芳，1995）。即令女性擔任媒體工作者日眾，但受媒介組織和制度所限，亦可能再製階層化的性別關係，例如女性記者傾向從軟性和私領域的角度報導女性人物，不自覺地複製某些性別偏見（蕭蘋，2004）。另一方面，如前述女性記者，實際握有文化再現權力的女性多限於媒介或文化菁英，常民女性通常不被賦予書寫個人真實經驗的空間；例如，台灣流行婦幼雜誌即圍繞著媒介菁英刻意形塑的母職神話打轉，未能容許一般女性揭露母親角色扮演上的困難與痛苦（陳婷

玉，2010，頁 68）。傳統上以記者、編輯、專家和名人為內容生產者的家庭版／女性版面不免也落入這種菁英模式，未能握有媒介工具的常民女性通常由他者再現或論述，而非自我再現或自我論述。

二、參與傳播、自我揭露與敘事社群

媒體中的大眾參與，為社區傳播／媒體（community communication / media）的論述者所力主；社區媒體迥異於傳統媒體的傳輸（transmission）模式，廣為社區成員所近用，藉以交換觀點和訊息、參與媒介內容生產等，以滿足社區資訊、教育和娛樂所需（Berrigan, 1981, p.8）。這種參與取徑成為發展理論中「參與範式」（participatory paradigm）的基礎；「參與傳播」（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強調西方菁英在參與相對貧窮的非西方國家發展計劃時，應善用傳播工具，提供在地社區內外對話、協商的空間，以利草根成員完全參與，而非以下指導棋之姿，由上而下推動計劃（Sparks, 2007, pp. 57-58）。在此範型中，「參與」的可能方式包含對話互動、公共近用和公共涉入，以及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Jacobson & Kolluri, 1999, pp. 268-269; Servaes, 1996, pp. 17-18; Stuart & Bery, 1996, p. 200）。晚近社區媒體理論強調社區媒體有助民主社會公民的自我再現與公共參與，尤其在少數或弱勢群體自我表述上的意義更為重大；但近來西方主流媒體的經驗亦指出，媒體專業菁英在開放閱聽人參與媒介內容生產的同時，也試圖加以主導、操弄和控制，形成參與的閱聽眾與媒體菁英之間的緊張關係（Carpentier, 2003, pp. 426-427）。

由讀者自發撰寫、投稿於平面媒體的文章，因直接介入媒介內容的生產，與社區媒體和參與傳播中強調大眾參與的精神相仿。讀者投書／

來稿可能是意見的表述，也可能是親身故事的分享，前者為公共意見，後者則別具揭露自我生命經驗的傾向。Roseann Mandziuk (2001) 認為，當今媒體時興的告白文化，可以回溯自 1919 年創刊的美國通俗雜誌 *True Story*。該雜誌多由女性匿名投稿，披露個人私密經驗和真實情感，訴求真人實事，Mandziuk 指出，*True Story* 所刊載的文字往往在回溯敘事者生命的同時，反思、詮釋社會準則，時而挑戰現有規範，時而又穩固這些規範，也因而，儘管內容公式化且真實性可慮，仍具情感撫慰、生活引導和質疑社會成規的功能 (Mandziuk, 2001, p. 187)。

這類讀者故事雖因匿名有可能部份為寫手或編輯杜撰，卻也提供了常民女性書寫私密經驗的空間，並且因寫作者身份的尋常性及生命經驗的共通性，喚起其它讀者揭露個人故事。女性主義學者從寫作教學的經驗中發現，閱讀分享其它女性的親身敘事，往往可以鼓勵同屬女性的學生們動筆寫作。一方面，親身敘事（包含日記、書信及短篇自傳式故事）非屬傳統定義的文學，其寫作者多非作家或公眾人物，賦予讀者對於寫作的信心 (Hoffmann, 1985, p. 4)。另一方面，讀者與作者之間往往共享許多生命經驗，促使讀者在產生同理心和共鳴之餘，也勇於藉由書寫親身故事，抒發內心情感；藉由在課堂中朗誦分享，寫作者也激發同一課堂學員透過書寫進行個人的心靈旅程 (Waugh, 1985, p. 148)。Kai-ling Liu 認為，這種因親身敘事而結合、讀者即作者、在同理心下相互啟發且彼此聆聽的群體，可以稱為一種「敘事社群」(Liu, 2002, p. 12)。

三、媒介上的女性敘事社群與女性角色論述建構

一如 Teresa de Lauretis 所言，人們的主體性總是在敘事、意義和欲

望的關係之中構成：經由敘事過程，主體被安置於某種位置上，緊密扣連著某些社會文化意涵與欲望（de Lauretis, 2000, p. 206）。倘若敘事可以被理解為人們透過符號形式隨敘事路線組織意涵的言語行動（Brockmeier & Carbaugh, 2001, p. 4），那麼，這種行動在實質內涵上乃言說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的一種，經由不同的敘事體定義主體意識與其所在社會脈絡和其它文化文本之間的關係，從而為主體尋找安身立命的位置。在自傳性或其它形式揭露自我生命經驗的敘事體裡，敘事者以現在的我回溯過去的我，對於過往種種事蹟加以檢視、評量，或悔過或賦予正當性，而悔過或正當化的標準，經常建立在對於某種良善人生的假想之上（Freeman & Brockmeier, 2001, p. 80）；敘事者在定位自我（positioning）的過程之中，將自我經驗納入集體文化和社會經驗之中，其敘說與定義，也指涉所在社群的諸種規範與準則（Brockmeier & Harré, 2001, pp. 51-53）。

當這類揭露自我生命經驗的書寫者為女性時，其指涉的社群規範和假想的良善人生，往往與女性角色相關。西方研究指出，相較於男性自傳，女性自傳或親身敘事更傾向探觸性別的問題；雖然男性亦受制於性別規範，但畢竟是性別關係中的上位者，相對地，居於臣屬位階的女性在日常生活和生命歷程之中不免時時與性別角色和性別期望協商，因而，在記敘個人故事的同時，亦隨之呈現和詮釋性別角色對其生命的影響和衝擊，包括自我身份的建構、性別規範下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女性與男性之間的權力關係等等（Personal Narrative Group, 1989, p. 5）。據此，女性自我敘事話語所記述的，不僅是個人對於某些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自我所做的反思與定義，也揭露了個人所面臨的角色期望，以及個人對於自我所扮演的性別角色所進行的省思、詮釋和評價。

這類女性自我敘事通常以自傳、日記、書信，或前述寫作課程學員

所撰寫的短篇自傳式散文等方式呈現。前三種多以零散、非群聚式的方式個別產生，後者則構成 Liu 所定義的敘事社群。不過，如 Liu 親身參與的讀書會所示，以寫作班成員及其敘事所構成的敘事社群在課程結束後即解散；這類敘事社群所生產的敘事也可能限於社群內成員分享，不見得能對外和集體發表。因此，此類敘事社群所生產的女性自我敘事及角色反思，雖能引領女性建構個人身分和角色定位，卻不易受到公共大眾閱聽。

相較於此，如「家婦版」這一類以大眾媒介為傳播管道並常態生產的自我敘事，則因其生產傳播方式成為媒介言說的一環，從而進入相關公共論述建構的過程。媒介言說一詞，在批判語言學（Critical Linguistics）和批判言說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分別於 1970 年代及 1980 年代興起後，逐漸成為媒介研究的關鍵字。這些學派以馬克斯主義的意識型態批判和傅柯的論述理論為基礎，將微觀言說分析的概念帶入當代媒介文本研究（Deacon, Pickering, Golding & Murdoch, 1998/1999, pp. 144-155）。除上述學派，文化研究學者霍爾（Stuart Hall）在早期經典“Encoding/decoding”文中，亦以言說替代內容（content）一詞，指稱媒介訊息及其涉及的意義、思維、知識和意識型態（Hall, 1980, p. 131）。這些關於媒介言說的界說與定義，結合了言說一詞的微觀和巨觀層次，兼指媒介文本中的具體語言傳播事例（Johnstone, 2002, p. 2）以及其中對於某些事物的慣常說法和規約性的論述（Baker & Galasinski, 2001/2007, p. 2）；前者依循語言學對於此詞的慣常定義，後者則追隨了傅柯在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中對於該字的再詮釋（多譯為「論述」），強調論述與社會意義建構和權力生產之間的關係。晚近傳播學者則以此為基礎，不拘文類和符號形式，將所有生產於媒介文本上的文字、聲音和影像訊息視為媒介言說，強調其中所

夾帶的文化社會論述，及其穩固、複製或重新建構該等論述的力量（Macdonald, 2003, pp. 1-4; Bell & Garrett, 1998, p. 3）。

植基於論述建構學派，媒介言說的概念適切指出文本蘊含以及重構廣大社會文化論述的可能，而這種可能性，也正是本文認為「家婦版」上的親身故事值得關注之因。回顧前論，自我敘事對於生活處境和生命經驗的詮釋和評價，往往建立在敘事者對於集體規範和社會價值的認知與接收之上，而女性自我敘事話語所反思的處境／經驗與涉及的規範和價值，則經常與女性角色相關。究竟，「家婦版」上由常民女性書寫的親身敘事是否也如前行自我敘事研究所示，在生產媒介言說之際揭露敘事者對於女性角色的認知和評價，體現對於前行相關論述的接收，並且參與該等論述的重新建構？

同時，前引敘事社群的概念，也引導我們進一步思考這些敘事者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對於「家婦版」內容生產的可能影響。如前言一節所述，「家婦版」的敘事者往往為該版讀者，身為該版閱聽人社群成員之餘，又跨越閱聽人的身份界限，直接介入內容生產的過程；這種基於閱讀共享和書寫參與自我敘事所產生的聯結關係，近似 Liu 所界定的敘事社群成員所共有，但不同於讀書會或寫作班，「家婦版」的讀者／作者群可能散居各方、互不相識，彼此之間的可能互動亦在非面對面的接觸和非即時性的傳播中進行。另一方面，因為「家婦版」的版面特性，其敘事者除卻傾向為女性，亦以女性家庭生活議題和處境為共同關注所在。做為一個集體，「家婦版」敘事群多少揉雜了閱聽人社群和虛擬社群的特質，兩者的社群形成皆以媒介中介的日常生活實踐為徑，因共同關注某些文本、議題，或分享某些興趣或利益而發生，並且不受限於地理位置所在、彼此是否相識或能否面對面接觸（Homes, 2005, pp. 175-176）。出於這些特質，我們或可將「家婦版」的敘事群視為媒介

中介、由非媒介或文化菁英所構成的常民女性敘事社群，如稍後所示，此一敘事社群如同面對面接觸者，成員之間亦具有相互啟發、聆聽、回應，甚至支持和濟助的互動關係，而這些互動關係也正是該版得以持續生產女性自我敘事的動力之一。

以下個案研究即以「家婦版」的常民女性敘事社群特質，以及該社群所生產的自我敘事與女性角色論述建構之間的關係為分析對象，探討該版如何容許名人、專家或媒介菁英以外的女性敘事者集結、互動，生產揭露女性日常生活處境和角色難題的親身敘事，而這些敘事又透過何種反思過程與既有女性角色論述對話，並且在此對話過程之中再次建構相關論述。有關資料搜集和分析方法於下一節進一步說明。

參、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依研究問題意識分為三個路徑，分別為版面觀察、內容分析及言說分析。為探討該版的常民參與以及親身故事轉向，本文作者分別以翻閱過期報紙和訪談現任主編的方式收集資料。除逐日翻閱 2002 年 1 月和 2 月全月份的文章，另以抽取每月 1 日（如 2001 年 12 月 1 日、11 月 1 日等）報紙為樣本的方式，回溯至 1998 年 1 月、該版內容以記者／編輯寫稿、邀稿、徵文等為主的期間，並且以同樣抽樣方式抽閱 2002 年全年份的報紙，以確認編輯策略是否有變。除此，亦於 2010 年 7 月訪談「家婦版」主編楊錦郁，了解該版編輯方針、選稿原則和編輯檯所扮演的角色。由於主編本人亦為散文作家，本文作者同時閱讀了她所創作的散文作品，以了解主編個人寫作風格對於家庭版文章呈現方式的影響。³

文本分析部份，以刊登於 2008 年 7 月至 2010 年 7 月的之文章為樣

本收集對象。本文作者對於《聯合報》「家庭與婦女」的研究興趣始於 2008 年，並於同年 7 月起逐日收集實體報紙，為方便資料分類，自 2009 年 10 月後停止實體報紙收集，改從《新聞知識庫》數位資料庫收集該版文章至 2010 年 7 月底止。在停止收集實體報紙後，仍以不定期讀報方式，觀察該版在版面配置上是否產生變化。受限研究時間及人力，本文僅收集兩年份的剪報做為文本分析樣本，或許不足以說明該版歷時性的變化；但這兩年期間是散文作家楊錦郁接手主編工作近三年後，版面風格穩定，適可展現現階段「家婦版」的常態並提供典型案例。該版限定投稿內容為真實故事，並且偏好書寫親身經歷的文章，不過，實際刊登的文章中仍有許多描述、評論他人故事的文章。這些文章固然呈現敘事者的觀點和價值判斷，但因不符本文限定的自我敘事先被排除，若干反思性不明確的文章（如生活趣事記述等）亦被剔除。根據以上篩選原則共搜得 604 篇文章做為文本分析的樣本。

如文獻探討一節指出，女性自我／親身敘事經常涉及對於女性角色的反思，為觀察「家婦版」上的敘事是否也有此傾向，作者區分「母親」、「婆婆」、「女兒」、「媳婦（妯娌）」、「妻子」和「姊妹」等六種依據親屬關係劃分的女性家庭角色做為編目依據，進行分類。其中，因討論妯娌關係的文章關係女性在婆家的處境，在編碼時與「媳婦」併為一類；當敘事者在文中同時述及一種以上的家庭角色，則依這些角色在文章中的重要性擇一分類。樣本中許多論及婚姻觀但涉及家庭角色不明確的文章，則另設「婚姻觀」一類；這類文章雖未直指敘事者角色，但婚姻中的女性不免涉及妻子或母親的角色，在此亦視為與女性角色相關。分類編碼工作，先由本文作者與研究助理討論原則，在助理進行初步分類後，本文作者再逐一核對確認、做最後的統計工作。

為探討該版的社群關係，作者以立意擇案的方式，擇選一系列讀者

回應文章做為分析對象，觀察成員間彼此啟發和對話的過程。此外，另擇選典型案例，說明女性自我敘事如何經由回溯反思個人生活處境和生命經驗，參與建構性別論述，分析時著重涉及自我評價的話語，以及該話語所對應的性別規範與角色期望。以下即就「家婦版」的常民女性敘事社群的形成，以及敘事話語中的論述建構，分立兩個小節進行探討。

肆、分析與討論

一、「家婦版」上的常民女性敘事社群

讀者投稿在「家婦版」的歷史很長，但是以之為全版常態內容卻是晚近幾年的事。一九九八年的「家婦版」仍採取傳統家庭版經營模式，以編輯、記者撰稿以及專家、名人或散文作者等外稿為主要來源，內容則以生活常識（包括醫藥、健康、家事等）、育兒、教育、家庭或親密關係維繫之道為核心，時而穿插人物、活動報導（尤其是《聯合報》系活動）或各種書評及徵文活動，包括有關婦女、兒童等非營利組織的活動宣傳及理念論述。相對地，讀者文章的份量小得許多，但仍有不少具專業背景的讀者，投書分享經驗、知識或表述意見，這類投稿者的名字後會被註明頭銜，例如國小校長、社工人員等，文章主題範疇則從教育理念、社會福利乃至理財投資、用電安全不等。至於不具頭銜、來自各地的「讀者」投稿亦有之，內容從生活故事到意見評論皆有。

到了 2001 年，讀者文章數量明顯增加且頻率趨向穩定，平均每天約有兩篇。2002 年 1 月的「家婦版」，每日讀者文章（包含具頭銜者）的數量已多於傳統稿源，內容上意見和故事約各半，意見評論的議題則不限於家庭或教育問題。同年 2 月一系列春節專刊結束後，「家婦

版」的讀者參與轉向更為明確，每日刊出四到五篇，除了諮商專家吳娟瑜每周固定供稿一篇及偶而出現的人物報導和食譜之外，「家婦版」上已全數為讀者文章。同時，讀者文章也轉向以敘事為主軸，意見評論或分享專業知識的文章逐漸讓位。2003 年 5 月 11 日，該版最後一次刊出諮商專家吳娟瑜的文章，全版以讀者文章為內容的編輯方向確立。

目前的「家婦版」位居「家庭副刊」封面頁，每日以半版的篇幅，刊登四篇文章，文章長度從五、六百字到兩、三百字均有，主文並搭配插畫。據訪談，報社高層對於「家婦版」的編輯政策限定在全民寫作和真實故事，因此該版文章全數為讀者投稿，並且一律為記敘生活故事的短文。文章作者名字（通常為筆名）後以括號註明作者居住地，並不另行標記「讀者」兩字，至於作者頭銜因報社強調全民寫作也一律不再予以註記。

轉向後的「家婦版」將編輯臺的角色限縮為審稿、潤稿、標題訂定或修改、主文安排和欄名設定。報社高層對於該版的編輯政策僅限定在全民寫作和真實故事，其它方面則交由主編權衡；至於主編的審稿標準，除了報社原則，主要以故事的可讀性、文章的多樣性、能鼓勵人心、反應人性的溫暖，以及調和人際衝突等正面性為考量。改稿時著重文辭的流暢和標點、錯別字更正，儘量不改變原作者的語氣和文意，使得文章中的觀點和價值仍為原作者所有。⁴就文字風格而言，「家婦版」的故事在親切可讀之餘，多半平易素樸，與主編個人散文作品中的文學性書寫有顯著的差異，⁵顯示編者在改稿時涉入有限。

必須一提的是，《聯合報》在改版時雖以「全民寫作」和「大眾化」為旗幟，但若考慮該報讀者群特性，便可發現所謂的「全民」／「大眾」有著一定的門檻。根據該報官網所提供的 2004 年調查資料，⁶《聯合報》的讀者個人月收入高於 30,000 元者超過六成（62.7%），其

中 15.8% 高於 60,000 元。就報業歷史而言，《聯合報》在解嚴前取代《中央日報》，成為國民黨意識型態的代表者（黃順星，2010），確保了該報早期在軍公教階層中一定的讀者群。早先研究亦指出，《聯合報》家庭副刊的編輯政策傾向維繫社會既有價值（田裕敏，1998）。也就是說，「家婦版」上的讀者／作者社群，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中產階級屬性。

儘管如此，「家婦版」在前述編輯政策與作業模式下，仍然具備素人書寫與常民敘事空間的特質，其作者不具公眾知名度或作家寫手的文學書寫能力，也非專家學者或媒介菁英。由於「家婦版」長期以女性家庭生活相關議題為主軸，該版上的常民故事經常呈現女性常有的生活經驗或問題，引發閱讀者在同理心下投書個人故事。根據樣本，若干作者即在文章中提及，因為閱讀版上文章，遂動了書寫自己故事的念頭。這種因為聆聽他人敘事，進而受到啟發書寫自我敘事以表回應的傾向，在註明回應前文的案例中（通常標記為「讀者回應」或「我也有話要說」）更可明顯觀之。該版中，回應文佔有一定的份量，以 2009 年 7 月到 2010 年 7 月為例，一整年份的「家婦版」中，即刊登了 55 篇註明回應前文的故事。這類回應文章，不論是對於前文所提的處境心有戚戚焉，或是予以安慰鼓勵，或是溫和勸說，或是就問題提出解決之道，大都以個人經驗的分享做為回應的基礎，並從相互濟助的精神出發。刊於 2009 年一系列有關母職的自我敘事，適可說明敘事者之間如何以共有的生命課題為關注核心，分享經驗並相互扶助的互動模式。

這一系列回應文始於〈何苦念兩個碩士？〉（2009.10.27）一文。〈何〉文作者敘述自己初為人母，為全心哺育孩子辭去公職後，懷念經濟自主和自我成就的日子，並且感嘆早知如此，何苦念了兩個碩士。這篇文章引來一連串表明回應該文的親身故事，包括〈用心享受小孩的成

長〉(2009.11.3)、〈有空替她看孩子〉(2009.11.4)、〈親手教養終不悔〉(2009.11.9)、〈孩子大了，隨時可以回職場〉(2009.11.13)及〈職業婦女的小孩〉(2009.11.19)。其中，〈有〉文及〈職〉文皆以感同身受的立場發聲，披露類似的經驗和感嘆。〈有〉文以「拜讀〈何苦念兩個碩士？〉一文，實在是心有戚戚焉」起首，自陳於懷孕時辭去工作後成為全職母親，但不同於〈何〉文，〈有〉文作者為重返人際交往和經濟獨立的日子，選擇在孩子尚年幼時將諸交付外婆照養，回到職場。〈職〉文起首則表明看到〈何〉文引起回響後，感到「同樣心有戚戚焉」，隨後揭露類似的母職經驗；作者回憶自己為照顧雙胞胎辭去工作，鎮日與奶瓶尿片為伍，當初承諾給她「褓母費」的丈夫不守承諾，令她成為沒有尊嚴的經濟依賴者，後悔之餘試圖重回職場卻發現謀職不易，只能屈就低職。從作者揭露的個人經驗可見，這兩篇回應文「心有戚戚」之處在於同感女性為母職放棄事業的掙扎與不願，但不同於〈何〉文的是，兩人均選擇重回職場。相對地，〈親〉文與〈孩〉文作者雖然一如〈何〉文作者為母職放棄工作，但對於自我選擇卻甘之如飴。〈親〉文以閱讀〈何〉文後「心中感觸良多」一語，開啓自我母職敘事。文中自言與〈何〉文作者一樣，面臨母職與工作取捨的普遍問題，然而，不同於前者，〈親〉文作者細數全職母親的美好經驗，並以認同自我價值做為結語，間接鼓勵安慰〈何〉文作者：

曾經，我也像小筍子的媽媽，有不錯的工作和獨立的經濟能力，還可隨心所欲支配自己的時間，只是，現在我更喜歡帶孩子。至於接受較多的教育，反而有助於培養較好的 EQ，處理自己及小孩的情緒。如今女兒懂事貼心，這一切，是再多的金錢及時間都無換取的。

在引文中，作者自言過往歷程與〈何〉文作者（「小筍子的媽媽」）相仿，並以親身經驗指出高等教育程度有助於育兒，勸慰〈何〉文作者毋須感嘆白費學歷。如同〈親〉文作者，〈孩〉文亦於文首指明回應〈何〉文，揭露個人母職經驗；作者表示曾如〈何〉文作者般，歷經自我懷疑的階段，但回顧過往卻感到快慰；文中亦強調全職母親的無價報酬，並以個人在孩子長大後重回校園攻讀博士學位的親身經驗，勸說其它母親以日後重回職場做為問題的解決方案：

…兒子即使到了青春期的，比我高一個頭，還是經常跟爸爸媽媽擁抱，這種愛不是每個人所渴求的嗎？我們願意用世上任何成就和財富來換取嗎？

孩子童年只有一次，他們很快就會長大了，我們也隨時可以回到職場。相信能為公司服務的人很多，但是能當孩子媽媽的卻只有我們自己一個。

〈用〉文對於全職母親的看法與〈孩〉文、〈親〉文相仿，不同的是該文作者雖然一心想為育兒辭去現職，卻在家人勸阻下作罷。包括〈何〉在內的這一系列文章皆從作者個人的親身經歷出發，幾則回應文不論自我評價如何，徘徊於母職和工作之間的處境均十分類似。這種經驗上的共享，一方面促成前文對於後文的呼喚與啟發，另一方面形成彼此之間因處境相仿而生的共同身分；〈孩〉文在指明回應前文時，兩度以「我們」稱呼自己及其它母親，顯示此一依境而生的集體身分意識。同時，從系列文章可見，回應者或從同理心向他人提供道德支持，或就共有處境提出不同的評價或建議，即令觀點不同，亦不針鋒相對；勸說者雖以過來人之姿立論，卻是站在感同身受的立場和集體成員的位置上發聲，並不訴求權威或專業。這些藉由自我敘事呼喚共鳴或回應他人的話語，不論註明回應文與否，宛若常民女性之間傾訴心聲、相互扶持的

家常對談，彼此之間因為分享某些生命經驗或面對共同的困境難題而產生情感上的連帶，並於平等互助的基礎上建立互動關係，與傳統家庭版的諮商專欄或專家意見中的指導關係大異其趣。也正因如此，該版得以建立社群共感，促使版上敘事在呼喚和回應聲中不斷生產，延續此一敘事社群的生命。

二、常民女性自我敘事與女性角色論述建構

儘管「家婦版」的常態徵文啓事完全未提及徵文方向，平均一天六十篇的來稿，幾乎都集中在有關家庭生活場域和家人關係的題旨，舉凡夫妻相處、育兒之道、母職經驗、雙親奉養、財務問題、家產分配、婆媳關係、親子衝突，到家庭暴力、離婚外遇、情感糾葛等。⁷ 根據觀察，本文搜集的 604 則樣本中的 542 篇可依其敘事者自居的家庭角色，分列入方法一節所列的六種類角色目，其中以「母親」（197 則；33.7%）和「妻子」（163 則；27.9%）佔大多數，「女兒」（99 則；17.0%）和「媳婦」（72 則；12.3%）次之，「姊妹」（8 則；1.4%）和「婆婆」（3 則；0.5%）最少；其中 42 則（7.2%）歸入「婚姻觀」一類，另 20 則因不吻合編碼條件，無法歸類。

這項分析結果呼應了前引研究所稱，女性自我／親身敘事傾向反思個人所扮演的性別角色。大體而言，版上親身故事的敘事者經常在文章中描述個人過往或現今的經驗、作為，或面臨的問題和處境，並且在敘事過程中為個人的處境或作為提出疑問或自我評價，也就是本文所探討的敘事反思：回溯往事者以今日之我回憶、記述和反思昨日之我，而描述當下者則以書寫的我反思位於某種處境或面臨某種問題中的我。如前所述，女性自我敘事中的女性角色反思，往往建立於敘事者對於當前性

別論述的認知和接收之上，當敘事者試圖詮釋、評價過往或當下的自我，也正與賴以自我詮釋和評價的性別角色期望和規範論述進行對話。經由對話的話語，敘事者直接或間接參與了社群共享的性別論述建構。

這種經由敘事反思與既有性別論述對話的過程，通常體現於敘事者對其處境／作為的置疑、肯認，或者悔悟之上。前引〈何苦念兩個碩士？〉即為經由置疑與性別論述對話的案例。文中，作者自陳忍痛去職、成為全職母親不到兩個月，「心底的懷疑與恐慌」卻在哺育新生兒的過程之中揮之不去：

每當我抱著小筍子餵奶時，不禁會想，我個人的價值在變成全職媽媽後，似乎僅繫於寶寶的照顧工作上。大家都認為我的第一要務就是把小筍子養得健康又快樂，不再有人提起我的興趣、志向、生涯規劃等，我從此與寶寶緊密相依，難以分割。

辭職的我，除了扮演好媽媽這個角色，沒有其他更重要的自我價值衡量基準，於是我從小到大的企圖心或表現就此煙消雲散。不禁嘆口氣，早知如此，又何苦念兩個碩士，不如直接去上保母訓練課程更實在吧！

依據引文，作者的懷疑與恐慌來自無法安然將全職母親視為個人價值所在。引文首段指出，「大家」將作者的角色設定為母親，無視其母職之外生命實踐的重要性；在此，「大家」一詞所指涉的應為作者的家人親友，而作者所面對的，也正是家人親友對她的角色期望（「扮演好媽媽這個角色」）。顯然地，這種角色期望與作者自我期許有所落差，在抱憾個人興趣志向不再有人聞問、自小到大的企圖心和表現煙消雲散之際，敘事者所置疑的是，完美母職做為女性自我價值唯一準則的意義；而感嘆何苦念兩個碩士、不如直接上保母訓練班的話語，則顯現敘事者對於當下處境的詮釋和無法肯認的評價。經由對於現有處境的慨嘆

以及角色價值的懷疑，這則自我敘事除卻指出當前女性普遍面臨的難題，同時也向傳統性別規範下的母職實踐模式提出質疑，其質疑基礎，在於敘事者原本以自我實現為生命目標的價值之上。這種因角色衝突所帶來的自我懷疑，體現了女性主義與傳統性別規範之間的角力關係。相對於傳統女性角色規範強調養兒育女職責，晚近本土女性主義自 1970 年代萌芽並於 1980 年代生根茁壯以來，女性的自我實現一直是其中論述的核心（顧燕翎，1989）。〈何〉文作者選擇傳統母職、卻不能肯認於斯的話語，間接加入了此二種論述對峙爭霸的過程，突顯當前女性夾處其中的困境。

相較於此，前引〈親手教養終不悔〉及〈孩子大了，隨時可以回職場〉兩文則以肯定自我的話語，參與建構關於母職的媒介論述。如前引文，兩文將子女的成長和愛等同於全職母親的報酬，並強調這種報酬勝於任何成就和財富。透過敘事中的正面自我評價，兩文引述並鞏固了傳統母職論述，將育兒視為優先於一切的女性天職，而女性最大的成就亦在於此。值得注意的是，「家婦版」上的敘事在肯認傳統母職價值時並不見得一味宣揚傳統，無視於女性主義的核心論述；以〈孩〉文為例，作者重返校園的親身實踐以及提議的解決方案，均可視為對於女性自我實現論述的回應。換言之，〈孩〉文所顯示的，毋寧是一種與傳統性別規範和女性主義論述協商下的言說，而非單純複製傳統論述，這種協商性的言說，一如〈何〉文的置疑話語，有賴常民女性的親身經驗和自我揭露方才得以產生；正因為（曾經）身處該問題之中，才可能因衝突而協商、置疑，乃至採取行動、揭露經驗與自我評價。

除卻置疑與肯認，「家婦版」上的自我敘事亦常常出現昨非今是的悔悟話語。

前引〈職業婦女的小孩〉文中，作者二度就業不如人意後所發出的感嘆，顯現著對於先前辭職之舉的悔悟之情：

走了這麼一遭，我才發現，其實有成就的母親，可以給小孩更多的支援。我相信，如果當初沒有離開心愛的工作，我可以給孩子的資源會比現在更多！

這段話語中，敘事者有感而發，自言當初決定有誤及錯誤之處何在，直接指出心目中理想的母職實踐之道；經由悔悟興嘆陳述已見，敘事者亦為媒介中的母職論述增添一筆「母親成就有益育兒資源」的陳述。從樣本觀之，「家婦版」中的悔悟興嘆亦經常以「揮別過去，迎接新生」的隱晦模式呈現，敘事者雖津津樂道於今日之我，並不必然完全否定昔日之我，〈屬於我的黃金歲月〉（2008.10.1）一文即顯示了這類的言說模式。文中，作者指出自己在過往二十餘的歲月裡，奉行求學時一位老教授的話語，以家庭為事業、以先生和子女為資產，盡職扮演各種角色，直到孩子成長後才驚覺未能「做自己」：

幾十年來，感覺上，我總是載著頭盔及各種面具，在人生的隧道中拚命的往前衝，一刻都不得歇，更無暇回頭看，很「認分」的扮演好每個角色，但忘記自我的存在。直到去年，老二也到外地讀大學，我失去了「被需要」的感覺後，才心念一轉，眼前豁然開朗，彷彿這列滿載「責任」二字，長久行駛在山洞的火車已見到洞口的曙光，我欣喜這是人生另一起點，因我將可卸下這些甜蜜的負擔，尋回自我。

如引文，敘事者在感悟過去自己忘卻自我存在之際，並不否定過去認分扮演各種角色的生命歷程，而是以「心念一轉，眼前豁然開朗」之語，形容自己超脫善盡角色期望的模式，準備迎向新的生命旅程。作者接續描述當前的自己如何樂在修習社區大學課程、當志工及登山休閒等活動，並讚嘆為「屬於我的黃金歲月！」。在此，我們可以看到類似前

引〈孩〉文中的論述，將照護家庭看成愛的勞動（「甜蜜的負擔」），而自我實現的實踐則為人生不同階段；文中雖指出女性角色扮演和自我實現之中的衝突性，並未積極評價其取捨，而是在兩者之間調處、協商。

這種自我調處與協商的傾向，使得版上時而出現置疑、悔悟或者肯認的聲音混雜於單一故事的景況，令其敘事反思中的自我評價呈現曖昧與矛盾之情。例如，〈失去的，要自己找回來〉（2010.6.26）文中，作者自述在事業高峰的當下去職育兒十數年，某日乍見舊職搬遷後的新址，心中異常失落，自此陷入嚴重的憂鬱之中。回溯這段懊悔苦痛與自我懷疑的日子時，作者以「陷入迷失」形容當時的自我：

那天路過銀行回家後，我陷入了一個嚴重錯誤的迷失，認為當年捨棄職場是愚蠢的，這使我如今不能擁有社會地位和財富，我因此不滿自己，甚至質疑自己存在的價值。

作者接續描述自己如何處於憂鬱痛不欲生，所幸在丈夫和孩子的情感支持下覺醒重生：

在我沮喪憂鬱的日子裡，圍繞著我的是外子不捨的安慰，以及孩子們貼心溫柔的鼓舞，於是我忽然覺醒：成就感也好，自信心也好，失去的，要自己去找回來！

如上所示，作者以「陷入了一個嚴重錯誤的迷失」之語，評論自己早先懊悔放棄事業成就並懷疑自我價值的心態，顯現昨非（陷入迷失）今是（覺醒重生）的自我詮釋和悔悟之情；依第二段引文（該文結語），作者覺醒後所體認到的，並非身為全職母親的價值，而是要靠自己找回失去的成就感和自信心。據此，作者雖以迷失一詞詮釋不能滿足於全職母親的自我，似是肯認了當年放棄事業的選擇，但在結語中以找

回成就感與自信心做為重生後的目標，又暗示著作者終究不能以養育兒女為成就感和自信心的來源。這則親身故事記述了質疑自我、悔悟過往和接受當下的心路歷程，而這段歷程，如同前引幾則母職敘事，根植於敘事者面臨的角色價值取捨，以及試圖調處衝突所做的努力；在曖昧不定的自我評價中，敘事者間接論述當代女性周旋於新舊角色典範下的困境：倘若不能自足於傳統母職是一種迷失，而照護家庭又無法成為現代女性成就和自信的根源，那麼她們的出路又將在何方？

這些普遍共享的矛盾心境與角色難題，正是「家婦版」上敘事源源新生之因。如編碼結果顯示，除卻前引文本中的母親和妻子，版上敘事反思所至，遍及各種女性角色，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分析，僅能擇要討論樣本中最顯著的角色類目，藉以說明這些匯聚於大眾媒介中的常民女性自我敘事，如何經由若干模式的反思話語，直接或間接參與建構關於女性角色的論述。至於「家婦版」做為常民女性敘事社群及常民敘事論述的意義與限制，將於結論一節進一步探討。

伍、結論

本文指出《聯合報》「家庭與婦女」版與晚近以來媒介參與轉向和自我揭露風潮之間的關係，並將該版上的常民女性自我敘事視為一種媒介言說，試圖透過版面觀察和言說分析，檢視該版形成敘事社群並參與當前女性角色論述建構的可能。據此，本文從本土女性版面研究的成果出發，指出此類版面做為女性論述空間上的意義，並藉由回顧參與傳播、告白文類和女性敘事社群的相關文獻，以及探討女性自我敘事做為媒介言說的意義，做為闡述媒介常民女性自我敘事與女性角色論述之間關係的基礎。

個案分析的第一個小節首先說明「家婦版」由傳統家庭版的編輯模式（由編輯、記者、名人專家或散文作者撰稿）逐漸轉型至全數為讀者故事的現況，以及編輯檯和讀者群所扮演的角色，並指出該版的中產階級屬性；接續以一系列有關母職實踐的回應文章為例，分析該版如何在常民敘事和經驗共享的氛圍中，激發讀者自發寫作、彼此對話，形成以分享和共濟為基礎的敘事社群。第二小節假借內容分析，指出該版自我敘事恰如前行研究所言，傾向於反思敘事者個人扮演的女性角色，接續以立意擇案的方式挑選文本為例，說明版上女性自我敘事如何經由反思處境和自我評價的話語，生產論述女性角色的言說；不論是置疑、悔悟、肯認過往／當下處境與作為，或者曖昧矛盾、評價不定，敘事者以親身經驗為基礎，透過敘事中的陳述話語，直接或間接提出有關己身扮演角色的價值評斷或有待解決的普遍問題。經由大眾媒介的傳播，這些言說也在日常的讀報過程中為閱聽大眾所接收。

回顧回獻探討一節所述，平面媒體中的家庭（女性）版面經常扮演建構女性角色論述的角色，傳統上其論述參與者多為媒介或社會文化菁英，不具公眾知名度、專業頭銜或書寫專長的常民女性可著力之處並不多見。另一方面，女性自我敘事有助於女性思索、探討女性角色和性別論述，而常民親身女性敘事則有助激發敘事社群的形成和此類敘事的再生產，只可惜這類社群多為小眾共享且不易長期維繫。本文就「家婦版」所做的分析顯示，這種以讀者自發投稿、真實故事為內容，不執著於文學性且限縮編輯檯涉入程度的編輯策略，確實容許一個常態且長期的女性敘事社群產生，補足了當前主流大眾媒介言說多半限於菁英生產的缺憾。在其中，讀者群即作者群，藉由書寫分享經驗、相互慰藉，對話時彼此地位對等，不論專業和權威，但求同理心情和共濟精神；這些由常民女性書寫的敘事話語，在揭露和評價個人生命歷程之餘，同時也

進入有關女性生命議題的媒介言說，重構此一面向的社會論述。

相對於專家／菁英意見，甚或持專業背景的讀者投書，這類以自我敘事／親身故事為徑參與媒介性別論述的言說模式，更能直接揭露常民女性生命經驗，包括普遍共有的問題與困境，倘若其中論述可以為讀者所採納，或正因於此。然而，就個案樣本觀察所及，也因其論述生產乃立基於親身經驗，傾向心路歷程的描述和個人作為的評價，固然能與既有女性角色論述對話，但卻鮮少論及社福制度或社會結構在女性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前述母職文本為例，不論是甘於或苦於擔任全職母親者，皆以個人抉擇的對錯為關注所在，未能思索導致兩難抉擇的結構性問題，例如育兒制度的不完善及職場文化對於職業婦女的不友善等。換言之，做為建構女性議題論述的一環，這類媒介言說可能侷限於個人經驗闡述，不易進入公共政策討論的層次。如個案分析第一節中所述，轉型前的「家婦版」經常提供婦女運動及其它非營利組織發聲的管道，這種聲音在轉型後付之闕如，顯示此類媒介言說空間有所不能及的缺憾。

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這類以大眾媒體為中介的敘事社群或常民言說所涵蓋的經驗和聲音，究竟可能觸及多大的女性群體。畢竟，諸如在孩子長大後重返校園深造、當志工或遊山玩水（如前引案例）等方案，並非女性普遍皆有的選擇，「家婦版」上的常民女性敘事社群多少仍具有一定的階級屬性。除此以外，該版雖然不要求作者具備文學技巧，但具有閱讀、書寫的閒暇或習慣仍是很難免除的先決條件，這也使得未能合乎此一門檻者的經驗被排除在外，包括尚未習得中文書寫能力的女性婚姻移民。倘若，我們肯認常民女性言說對於女性論述建構的意義，那麼，如何促使大眾媒介維繫並擴充常民女性言說空間的涵蓋層面，容許更多元群體的女性聲音得以浮現，將是值得研究者繼續關切之處。

註釋

- 1 《聯合報》家婦版被放在家庭副刊的封面頁，是該落最容易被閱讀的版面。若從電子報點閱率來看，家婦版也經常名列前茅，例如 2010 年 10 月 25 日的「發燒新聞排行」中，家婦版中有三篇文章位居當天全報文章點閱率前三十名，同在榜上的包括知名藝人 Selina 在大陸拍戲嚴重灼傷以及蘇花公路在風災中斷裂造成慘重傷亡的後續報導。這些跡象顯示，家婦版在該報中的位置並不邊陲。
- 2 據「家婦版」主編楊錦郁指出，該版被歸類為家庭版，並不屬於文學性副刊。相較於此，同屬家庭副刊的「繽紛」版被歸為第二文學副刊，訴求通俗文學，題旨較為多元。以 2010 年 1 月 19 日的徵稿啟事為例，該報徵求的類目包括創意小語、追心方案、工作趣聞、幽默小品、難忘見聞及好人好事等，並強調「好故事+好文筆+好心情=繽紛好文」。同時，該版並以「尋覓繽紛好作者」為名，開設投稿技巧班，招募寫手加入該版寫作陣營（〈輕鬆自在寫生活〉，2010 年 1 月 20 日）。
- 3 楊錦郁的散文集《穿過一樹的夜光》收錄作者以第一人稱敘事，反思個人生命經驗的文字。書中涵及若干作者對於女性主體的省思，以及與家人、朋友之間的情誼，其敘事題旨在某種程度上與家婦版文章重疊，但文學性則非後者能及。見稍後討論。
- 4 有關《聯合報》高層對於「家婦版」的編輯政策和主編的審稿及改稿原則，參自訪談內容。
- 5 主編楊錦郁本人曾得中山文藝獎章。
- 6 該資料發佈於《聯合報》官網上具有宣傳性質的網頁上，並未說明調查方法。本文引用該資料僅為說明《聯合報》讀者群的大致屬性。見 http://www.udngroup.com/2c/promote/main.jsp?f_DOC_TYPE=5&f_MAIN_ID=381&f_PAPER_ID=1
- 7 有關平均來稿數量由主編提供，至於文章涵蓋的主題則參照主編訪談結果及本文作者實際觀察樣本得知。事實上，該版主編一直期望能夠收到多一些「現代獨立女性」的來稿，也曾考慮向相關的專業人士或作家邀稿，以開拓版面涵蓋的面向，但因報社傾向將這個版面開放給「素民」寫作而作罷。或因如此，該版的作者群多為「業餘寫手」，包括學生、家庭主婦、職業婦女、退休人士、年輕或未婚在職女性等。經常投稿者不在少數，據主編記憶所及，有人甚至一天投稿兩篇。本文作者在分析資料的過程中，也發現過同樣的筆名先後出現在不同的文章中。

參考文獻

- 〈輕鬆自在寫生活〉（2010年1月20日）。《聯合報》，頁D6。
- 田裕敏（1998）。《家庭生活周報反映的女性意識：以中國時報的「男男女女」版及聯合報的「男女」版為例》。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向陽（2001）。〈繽紛花編繪浮世：報紙「第二副刊」的文學傳播取徑觀察〉，《文訊》，190: 46-49。
- 江靜芳（1995）。〈報禁解除後「家庭生活版」十八變〉，《台大新聞論壇》，3: 112-125。
- 陳婷玉（2010）。〈當媽媽真好〉，《女學學誌》，26: 33-86。
- 湯克遠（1979）。《從報紙家庭版看台灣社會價值觀念之演化》。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順星（2010）。〈新聞的場域分析：戰後台灣報業的變遷〉，《新聞學研究》，104: 113-160。
- 楊選堂（主編）（2001）。《聯合報五十年：民國四十年至九十年》。台北：聯合報社。
- 劉佩詩（2006）。《「家庭版」沿革及女性角色轉變—以《中國時報》例（1959-2004）》。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蘋（2002）。〈形塑女性媒介的推手？女性編輯與報紙女性版面的產製〉，《兩性平等教育季刊》，20: 116-123。
- 蕭蘋（2003）。《在變與不變之間：報紙女性版面的產製與內容分析，1971-2000》。（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NSC 90-2412-H-110-001）。高雄：中山大學傳播管理所。
- 蕭蘋（2004）。〈新聞業中的性別政治：媒介組織對女性記者及其報導的影響〉，《新聞學研究》，81: 85-123。
- 賴信真（1996）。《台灣當代職業女性議題研究—以民生報婦女版為分析場域（1989-1996）》。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簡妙如（2008）。〈全球化的「更真實」狂熱：真人實境節目的心理技術〉，《新聞學研究》，94: 1-60。
- 蘇芳瑩（2000）。《由報紙內容分析家庭概念之變遷》。臺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顧燕翎（1989）。〈女性意識與婦女運動發展〉，中國論壇編委會（編），《女性知識份子與台灣發展》，頁91-139。台北：中國論壇雜誌社。

- Barker, C. & Galasiński, D. (2001/2007). *Cultural Studie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 Dialogue on Language and Identity*. London, UK: Sage.
- Brockmeier, J., & Carbaugh, D. (2001). Introduction. In J. Brockmeier & D. Carbaugh (Eds.), *Narrative and identity: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self and culture* (pp. 1-24). Amsterdam,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Brockmeier, J., & Harré, R. (2001). Narrative: Problems and promises of an alternative paradigm. In J. Brockmeier & D. Carbaugh (Eds.), *Narrative and identity: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self and culture* (pp. 39-59). Amsterdam,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Bruner, J. (2001). Self-making and world-making. In J. Brockmeier & D. Carbaugh (Eds.), *Narrative and identity: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self and culture* (pp. 25-38). Amsterdam,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Carpentier, N. (2003). The BBC's Video Nation as a participatory media practice: Signifying everyday lif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an online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4), 425-447.
- Deacon, D., Pickering, M., Golding, P. & Murdoch, G. (Eds.) (1998/1999). *Researching Communications: A Practical Guide to Methods in Media and Cultural Analysis*. London, UK: Arnold.
- de Lauretis, T. (2000). Desire in narrative. In M. McQuillan (Ed.), *The narrative reader* (pp. 204-211). London, UK: Routledge.
- Freeman, M., & Brockmeier, J. (2001). Narrative integrity: autobiographical identity and the meaning of the "good life". In J. Brockmeier & D. Carbaugh (Eds.), *Narrative and identity: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self and culture* (pp. 75-99). Amsterdam,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Garrett, P. & Bell, A. (1998). Media and discourse: A critical overview. In P. Garrett & A. Bell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pp. 1-20). Oxford, UK: Blackwell.
- Hall, S.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 Paul 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pp. 128-138). London, UK: Routledge.
- Homes, D. (2005). *Communication Theory: Media, Technology, Society*. London, UK: Sage.
- Hoffman, L. (1985). Introduction. In L. Hoffman & M. Culley (Eds.), *Women's personal narratives: essays in criticism and pedagogy* (pp. 1-5). New York, NY: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 Jacobson, T. L., & Kolluri, S. (1999).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as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T. Jacobson & J. Servaes (Eds.),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pp. 265-280).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Johnstone, B. (2002). *Discourse Analysis*. Malden, Mass: Blackwell.
- King, C. (1992).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A democracy of the gaze. In F. Bonner, L. Goodman, R. Allen, L. Janes & C. King (Eds.), *Imagining women* (pp. 131-139).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Liu, K. L. (2002). Reading and writing our own stories: The alternative reading group.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8(2), 7-30.
- Macdonald, M. (2003). *Exploring media discourse*. London, UK: Arnold.
- Mandziuk, R. (2001). Confessional discourse and modern desires: Power and please in True Story magazin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8 (2), 174-193.
- McNair, B. (2002). *Striptease culture*. London, UK: Routledge.
- Personal Narrative Group (1989). Origins. In Personal Narrative Group (Ed), *Interpreting women's lives* (pp. 3-15).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ervaes, J. (1996). Introduction: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and research in development settings. In J. Servaes, T. L. Jacobson & S. A. White (Eds.),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pp. 13-28). New Delhi, India: Sage.
- Sparks, C. (2007).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ass media*. London, UK: Sage.
- Stuart, S., & Bery, R. (1996). Powerful grass-roots women communicators. In J. Servaes, T. L. Jacobson & S. A. White (Eds.),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pp. 197-212). New Delhi, India: Sage.
- Wang, Y.-J. (2005). *Constructing collective identities in the Internet age: A case study of the Taiwanese-based Internet forums*.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Stirling.
- Waugh, S. (1985). Women's shorter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expression, identity, and form. In L. Hoffman & M. Culley (Eds.), *Women's personal narratives: essays in criticism and pedagogy* (pp. 1-5). New York, NY: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The Self-Narrative of Ordinary People as Media Discourse: Women's Words and Voices in the Women and Family Page of the United Daily News

Yow-Jiun W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a collection of gender narratives and discourses produced by ordinary women for the Women and Family page in the United Daily News. Through observations, interview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narratives, which are based on participation and self-disclosure, are constructed on sharing and equality, and that the women writers tend to inspire empathy and supportive dialogues among each other. Through self-narration and self-evaluation, these women allow themselves to construct discourses on the female roles that they play.

Keywords: media discourse, personal story, self-narrative, women's page

* Yow-Jiun Wang i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